

人民世纪的丰碑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

主编 闻立树

副主编 王世俊 滕文藻



红旗出版社

WLS TWZ
4 1
A7 A7

人民世纪的丰碑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

主编 闻立树
副主编 王世俊
滕文藻

红旗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08 号

人民世纪的丰碑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

主 编 闻立树 副主编 王世俊 滕文藻

责任编辑 张素兰 封面设计 戴克鉴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北京沙滩北街 2 号)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印刷厂

850×1168 32 开 11 印张 260 千字

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68—685—X/Z · 212

定 价 8.60 元

编辑说明

编入本书的下列各篇文章，同时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为避免重复印刷，本书只排印目录，内容从略。特此说明，敬希鉴谅。

王朝瑞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渊源及现实意义

(作者系北京经济学院马列主义理论部副教授，文章在《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专辑发表)

**全立文
闻立树** 学习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体会

(作者系河北工程技术高级专科学校经贸系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管理系教授，文章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发表)

吴家林 试论毛泽东建党理论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教授，文章在《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专辑发表)

邓英秀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管理系副教授，文章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发表)

王树荫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管理系副教授，文章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发表)

李雅儒 毛泽东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思考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研部讲师，文章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发表)

王朝文 论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管理系副教授，文章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发表)

邹兆辰 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历史认识理论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文章在《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专辑发表)

序

首都师范大学和一些兄弟院校、科研单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撰写了一本论文集《人民世纪的丰碑》，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主编闻立树教授请我写一篇序言。作为一个受毛泽东思想哺育多年的历史教师，我很愿借此机会，谈谈自己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几点浅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有志于毛泽东研究的同志，不仅应当熟悉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而且应当对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理由有二。其一，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既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也“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说明毛泽东的国际贡献和影响，就必须站在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其二，毛泽东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既由于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深刻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也由于他对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和现状具有透彻的了解。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势必要密切注意世界形势。例如，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写于 1946 年 4 月。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即将发动全面内战。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除了要估量国民党的力量以外，还要

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当时的美国看似强大无比，经济实力雄厚，并独家掌握着原子弹生产的秘密。一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因而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际上，苏联领导人对形势也做了悲观的估计，害怕中国内战将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于是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在这个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毛泽东英明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向前发展，必能克服战争危险。美、英、法和苏联之间，或早或迟将实行妥协。不过，“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5页）。这个具有极大革命胆略的决定，是建筑在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要充分说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还必须结合国际环境来谈，这就要求我们对世界现代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了不少关于毛泽东的生活以及轶闻趣事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些对于深入了解毛泽东是有益的，如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撰写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张贻玖著的《毛泽东读史》等。但也有一部分粗制滥造、歪曲事实的劣品，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我以为，研究杰出历史人物的个人生活是需要的，但应结合他的事业来写，才有意义。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是把杰出人物的性格同运动发展的快慢联系一起来考虑的。我们还应当注意，在

研究杰出人物的个人特点，如他的学识、修养、性格、爱好等等时，千万不可把这些特点夸大到决定历史的程度。普列汉诺夫说：“个人因其性格带有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表现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59—360页）这个见解是十分深刻的。

总之，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我们应当持久、深入、多方面地进行下去，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十分必要的。我是一个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对毛泽东十分崇敬，经常学习《毛泽东选集》，也看过一些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但自己没有作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以上仅就平日阅读所见，略谈两点浅见，不当之处，尚希读者和专家指正。

齐世荣

1993年10月12日

目 录

| | |
|---|-----------|
| 编辑说明..... | (1) |
| 序 | 齐世荣 (1) |
| 毛泽东的早期政治思想 秦英君 (1) | |
|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中国革命 清庆瑞 (19) | |
|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贡献 闻立树 (35) | |
| 毛泽东对国情的分析与战略的确定 陈文叔 (46) | |
| 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苏国衡 (57) | |
| 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财富 吴序光 (67) | |
| 毛泽东对利用资本主义问题的独创性贡献 王幼樵 (83) | |
| 毛泽东工业经济思想简论 黄东梅 (93) | |
| 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田玉梅 (101) | |
| 毛泽东在党的建设上的突出贡献 滕文藻 (109) | |
| 毛泽东的干部路线 李 民 (118) | |
| 毛泽东的团结观 王希永 (134) | |
| 毛泽东与中国民主党派的创立 杨淑娟 (147) | |
| 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民族理论 汪梅琪 (159) | |
|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 赵春旸 (172) | |
|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王素莉 周万亮 (186) | |

| | | | |
|-------------------|-----|-------|-------|
| 毛泽东的外交方针与国际战略思想 | 才树祥 | 李久林 | (201) |
| 毛泽东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 陈世英 | (214) | |
|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 | 袁远林 | (227) | |
| 简论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 啜大鹏 | (235) | |
|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 郭敏华 | 王世俊 | (246) |
| 毛泽东的人民价值观 | | 王锐生 | (256) |
| 浅论毛泽东的人生价值观 | | 王淑芹 | (263) |
|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魅力 | | 王瑞荪 | (274) |
| 毛泽东的体育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回顾 | | 王德佩 | (281) |
| 遵循毛泽东读史的原则和方法读史教史 | | 于友西 | (293) |
| 略谈毛泽东著作中的比喻运用 | | 张炼强 | (303) |
| 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 | 徐非光 | (313) |
| 毛泽东诗词的成就与特色 | | 李 涣 | (325) |
| 后 记 | | | (340) |

毛泽东的早期政治思想

秦 英 君

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政治上就具有强烈的参予意识，并显露出惊人的才华和独到的见解。毛泽东早期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这个时期他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认识以及由此提出的种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方面。

忧国忧民的参与意识 ——“五四”前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思考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自勉。他的忧国忧民参予意识首先体现在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

（一）“积弊甚深”的国民性

早在1912年春，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就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意识。他在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写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又说：“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嗷舌而讥矣”^①。此文被国文教员批为“切实社会立论，

^① 《商鞅徙木立信论》，《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2页。

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在这以后，青年毛泽东对中国积弊甚深的国民性又有进一步的认识。如 1917 年 8 月，他在《致黎锦熙信》中说：“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又说：“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①。又如，据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的日记记载，1917 年 9 月，毛泽东在与他的一次谈话中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又说：“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驳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②。

忧国忧民的参予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上述毛泽东的忧国忧民意识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湖南志士谭嗣同、杨昌济等，这些青年毛泽东所崇拜的人物，他们对中国积弱习成的国民性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毛泽东深受感染。如谭嗣同针对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痛心疾首地指出：“外患深矣，海军燐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③毛泽东称赞这是“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④。又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指出：“今

① 《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4、86 页。

②④ 《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39 页。

③ 《谭嗣同文集》第 60 页。

日中国国民实迫于生死关头，间不容发之时也，尚不自觉可为寒心，奴隶牛马万劫不复，吁其危矣”^①。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毛泽东与杨昌济之间，师生关系非同一般，耳濡目染，影响至深。同时，由于杨昌济的很多思想是来自王船山、谭嗣同等，毛泽东也必然直接或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

（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毛泽东早期的忧国忧民参予意识，还表现在他对当时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忧虑。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几乎把中国政治、军事、财政和领土主权囊括以尽。5月7日，日本政府又发出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限令袁世凯于四十八小时内作出圆满答复。袁世凯称帝心切，竟表示全部接受日方要求。对此，全国哗然。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集资将一些知名人士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言论刊印成册，题为《明耻篇》。该书由石润山先生编次和作序。毛泽东读罢，在封面奋笔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十六字，表现了青年毛泽东概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同时，他还针对报端披露日本内阁行将改组，日本对华政策可趋缓和之说，明确指出：“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②。从上述文字看来，虽然这时毛泽东对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还没有清楚的认识，但是已看到日本帝国主义

① 《杨昌济文集》第364页。

② 《致萧子升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页。

的亡我之心，告诫国人“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必须“注意东事”，“磨砺以待日本”。

毛泽东这时对于帝国主义的警惕，还表现在对沙俄的态度上。袁世凯执政时期，沙俄不断出兵我国西北边疆和黑龙江呼伦贝尔以及新疆阿尔泰地区。1916年7月，沙俄与日本狼狈为奸，达成“日俄协约”，分掠满蒙权益。对此，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提醒人们说：“近日朝野有动色相告者一事，曰‘日俄协约’。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告诫：“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同一信中，毛泽东对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面目一时还未能识破。幻想十年之后，中美两国携手制服日本。他指出：“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②

（三）“最愚者袁世凯”——对封建军阀的认识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中华民国建立后，革命果实却很快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随后有“二次革命”、“洪宪帝制”、“护国运动”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这个期间既有以杨度为代表的筹安会，又有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和中华革命党人组成的讨袁派。毛泽东积极站在讨袁派一边。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

^{①②}《致萧子升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52页。

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闻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①。毛泽东的这段议论，表明他对袁世凯称帝是深恶痛绝的。他和一师学生还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对当时形势表示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时局痛言》，广为散发，积极展开反袁活动。但是，毛泽东这时对封建军阀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跳出梁启超等讨袁派的窠臼，对梁启超等人日后提出“南北和解”主张亦表赞成。尤其是对袁世凯扶植和依赖的封建军阀还缺乏认识。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宣布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撤除军务院。毛泽东对此颇多赞词，他说：“中央举措，究可佩服”。“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②。又如，毛泽东当时还认为“湘省之祸”是由于驱逐湘督汤芗铭造成的。事实上，汤芗铭在“二次革命”时，是奉袁世凯之命到湖南镇压革命的。汤芗升督后，在督湘的三年间，滥杀无辜，时称“汤屠”。后来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不得不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并电促袁世凯引退。1916年7月，汤芗铭从湖南被逐走。对此，毛泽东却颇有烦言，认为汤芗铭治湘有绩，今被逐去“颇为冤之”。“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鷙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

^{①②}《致萧子升信》，《毛泽东早年文稿》第51、49页。

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要之，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①。上述说明，毛泽东当时对封建军阀的认识是有所见亦有所蔽，还未能从本质上识破封建军阀的真面目。

（四）“砥砺品行”，重塑“新民”

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民“民智污塞、开通为难”的认识，很早就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的主张。1918年4月，毛泽东等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几经酝酿，建立了‘新民学会’，从而将改良人心的主张付诸于行动。从新民学会的宗旨和会章中不难看出毛泽东这时心目中崇尚和理想的“新民”的含意。

由毛泽东等起草的会章规定：“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该会宗旨。会章要求会员：“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押妓”。十分明显，新民学会的目的是要改造个人和人类，其办法就是首先进行个人良好品行的培养，进而改造整个社会。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还经常号召会友，要“修学储能”，以探求“经纶天下”的救国救民之道。

毛泽东集合同志，砥砺品行，重塑“新民”的思想，同样也受到梁启超、杨昌济等人的思想影响。早在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时就提出了“新民”说。他在该刊宗旨中指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原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欠缺，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

^① 《致萧子升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3、44页。

之原本”^①。梁启超将“新民”作为该刊的宗旨，即要新我国家必先新我国民。“新民”思想启发了一代青年，毛泽东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在1910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阅读过《新民丛报》。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因此“读了又读”，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②。改造社会必先改良人心，也是杨昌济的一贯思想，他曾提出：“欲唤国民，先在醒自己。已苟自觉，斯能觉世”，他针对辛亥革命后，“人心风俗不见涤新而转有道德腐败一落千丈之势”，大声疾呼：“欲图根本之革新，必先救人心之陷溺”^③。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在进行一个严肃的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他首先从体察中国国民性入手，进而认识社会，并将改良人心，重塑“新民”的思想付诸于行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的这种忧国忧民思想主要受维新派的影响，与近代民主启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尽管这种以正人心进而正社会的改良主义主张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他日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接受激进的民主思想 ——由对康、梁的崇拜转向陈独秀

如果说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了解，仅仅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参予意识，并为改良人心，重塑“新民”而付诸于行动；那么五四运动后，由于“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产生转折，由过去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转向陈独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2页。

② 《致文永昌信》注（4），《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页。

③ 《杨昌济文集》第45页。